

元代文化研究 第二輯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編

中華書局

元代文化研究 第二輯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09.3

ISBN 978 - 7 - 101 - 06600 - 5

I. 中… II. 北… III. ①文化史 - 中國 - 元代 -
國際學術會議 - 文集②古文獻學 - 中國 - 元代 - 國際學術會議 -
文集 IV. K247.07 - 53 G256.1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28362 號

元代文化研究 第二輯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58 印張 · 150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00 冊 定價: 38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600 - 5

序 言

李修生 韓格平

元代社會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演進中的重要轉折時期，元代文化在前代文化的基礎上有許多創新，從研究元代文獻入手，進而推動宋遼金元明清文獻與文化研究的進展，是我們面臨的一項新的重大課題。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通過編纂《全宋詩》，形成了宋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通過編纂《全元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通過編纂《全元詩》，亦在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方面形成了各自的優勢與特色。當我們就上述問題的重要性均有同感的時候，就產生了共同主辦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共識，即：以整理中國古代典籍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為基本宗旨，以提高元代文獻整理研究質量、提升宋遼金元明清文化研究水平為基本目標，力爭通過本次大會交流心得、總結經驗、溝通信息、增進友誼、加強合作，力爭通過本次大會鞏固與擴大學術研究隊伍，開拓中國古代典籍整理與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經過各位代表與我們的共同努力，大會得以如期舉行。總的來說，本次會議取得了以下成績：（1）會議展示了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就會議代表提交的六十餘篇論文看，涉及到元代文獻專題研究、元代文學專題研究、元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元代歷史研究等諸多領域，反映出會議代表較寬的學術視野。同時，會議論文關注學術前沿，能夠就當前的學術熱點闡發自己的見解。例如，2007年8月，韓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公佈了《至正條格》（殘本）的影印本與校注本，本次會議則有四篇論文專門研討《至正條格》。可以說，本次大會是一次較為集中地展示當前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的大會。（2）會議展示了從事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所必需的良好文風。在會議論文和代表們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樣一種共識：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是中國古代典籍，研究中華傳統文化應當以研讀中國古代典籍為基礎，立足原典，力戒空談，方是治學正途。因此，不管是文獻考辨還是專題研究，本次會議論文總體上文獻功底扎實，立論也較

為堅實可靠。(3)會議展示了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的美好前景。參加本次大會的代表，來自于日本、韓國、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大家歡聚一堂，交流心得，切磋學術，溝通信息，增進瞭解，共同搭建了一個不同學科、不同地區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合作交流的良好平臺，對於進一步開展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籌備本次會議，得到了海內外眾多學者的積極回應與大力支持。大家紛紛提建議、寫論文，抽出寶貴時間參加會議，使我們主辦各方深為感動。為了開好本次大會，全國高校古委會在統籌全國古籍整理研究事業、全力資助北師大古籍所《全元文》項目的同時，為本次大會提供資助。此外，北京師範大學“985”建設基金、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全元詩》課題組亦為本次大會提供資助，在此，我們謹代表大會的主辦者表示深深的謝意！

為了更好地展示本次大會的學術成果，我們在大會收到的學術論文的基礎上，編輯了本論文集。我們希望這部論文集對於廣大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者能夠有所裨益，我們期待着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這一偉大的文化事業碩果繼出，興旺昌盛。

目 錄

序言	李修生 韓格平(1)
----------	--------------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發言

元代文學大勢說略	李修生(3)
元代文學研究展望	鄧紹基(10)
元詩文獻研究與《全元詩》的編纂	楊 鐮(13)
元刻本《至正條格》的發現	陳高華(18)
20 世紀哲學轉向與中國國學的問題	扎拉嘎(23)

一 文獻研究

韓國發現元刊本《至正條格》殘卷簡介	(日) 金文京(29)
讀《至正條格·斷例》婚姻條文札記	
——與《元典章·戶部·婚姻》相關條文的比較	張 帆(42)
關於元代驛站交通的新史料	
——讀《至正條格》	党寶海(57)
《全元文》作者小傳考補(元代科舉進士部分)	寧希元(70)
元人文集的整理與總結	
——《全元文》編纂特點及得失	邱居里(83)
《全元文》校讀	薛瑞兆(122)

明代佛教方志與《全元文》補遺	曹剛華(135)
中古時期蒙古語文獻及其特點	嘎日迪(154)
編纂《古今韻會舉要》的目的	(日)花登正宏(160)
《古今韻會舉要》之撰著與版本	(臺灣)李添富(169)
稿本《故中書舍人南豐先生曾公諡議》述略	張燕嬰(187)
宋王珪《華陽集》疑詩考	李言(197)
《淳南遺老集》版本源流考	王永(205)
耶律楚材傳世詩卷《贈劉滿詩》讀後	劉曉(212)
許衡“語錄”流傳辨析	許紅霞(230)
劉因文集版本考辨	辛夢霞(249)
胡炳文及《雲峰集》版本述略	孟德宏(271)
論元刊本《禮記集說》文獻價值	曹亦冰(280)
虞集詩文集元刻本考	李軍(283)
王沂《伊濱集》校讀札記	韓格平(297)
廼賢《金臺集》版本考述	段海蓉(307)
四庫輯本《宛陵群英集》無名氏詩考	劉倩(314)
楊維禎的散文評價、文集版本及輯佚問題	王樹林(321)
劉履《選詩補注》阮籍詩注評議	張建偉(330)
近五十年元雜劇選注本綜論	(香港)何貴初(341)
《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研究在日本	(日)赤松紀彥(354)
《元曲選》研究之檢討	戚世雋(366)

二 人物研究

李治與元好問交游考	趙平分 周新華(379)
西域人廉香林論考	童曉峰 陸曉春(385)
元儒倪士毅的生平與交游	(香港)朱冶(397)
戴良生平行蹤考論	魏青(410)
陳垣先生《薩都刺疑年》補證	劉真倫(429)

三 文學研究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在金代文學中的現實意義	牛貴琥(447)
郝經易學與詩學	李瑞卿(453)
《二十四詩品》虞集作考辨	羅 超(463)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風	查洪德(472)
從元代“館閣體”詩看元中期文風之轉換	
——以虞集、黃潛、馬祖常為例	張文澍(487)
迺賢《上京紀行》詩的文學史價值	王忠閣(501)
叙史寓志於詩	
——對元人王逢《梧溪集》的一些考察	(臺灣)許守泯(509)
張炎作品清人序跋題識摭論	王學松(524)
顧嗣立的元詩研究	蔣 寅(534)
姚燧散文的意義和影響	楊新勳(548)
元賦發微	李修國(554)
諸宮調對元雜劇藝術形式的影響	呂文麗(572)
元代神仙道化劇與民族文化性格	闕 真(577)
元代描寫燕地歷史及社會生活的雜劇初論	李真瑜(588)
元雜劇所描寫的關撲風俗	
——擲錢賭博的文化含義	(日)大谷通順(597)
元雜劇的“抑·揚”	
——文學小傳統在大時代文化之沉潛起伏	(香港)司徒秀英(613)
元曲審美表演論與古典戲曲唱、白傳統	寧俊紅(627)
傳統人格範式失衡境遇下的悲患與風流	
——白樸的心路歷程與其劇作的泛人文內涵	張大新(634)
重讀《琵琶記》：元末儒士高明的內心世界	(臺灣)汪詩珮(655)
試論蒙漢民族文化交流及其對元散曲創作之影響	雲 峰(683)

從元散曲看元代的節日民俗	翁敏華(701)
關漢卿散曲不同境態下的風格探索	吳偉凡(714)
元初理學背景下的《續夷堅志》	李獻芳(720)

四 歷史研究及其它

元代的對外開放與域外史研究	周少川(731)
高麗對蒙古文化的受容與排斥 ——以“蒙古風”為主	(韓)鄭錫元(747)
耶律楚材與蒙元對高麗政策	邱瑞中(759)
換一隻眼睛看元朝	馬冀(774)
從捕盜官到牧民官 ——以縣尉為中心觀察元代讀書人的仕宦困境	(臺灣)洪麗珠(780)
《通鑑》胡注中關於“心”的意義	(臺灣)張元(805)
《前後出塞錄》論略	李德山、劉奉文(820)
元代道佛對立的一端	(日)中野美代子(827)
關於元代道教史籍的幾個問題	劉永海(829)
熊朋來《五經說》初探	吳國武(841)
元朝時期朱子學在高麗的傳播	李勇植(853)
論吳澄對朱熹道問學與陸九淵尊德性的會合	王素美(860)
《南村輟耕錄·徵聘》辨析	魏崇武(883)

五 譯 文

楊瑀和他的《山居新話》 ——兼論元代的筆記小說	(德)傅海波著 周思成譯(897)
----------------------------------	-------------------

簡 訊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簡訊	李軍 辛夢霞(911)
----------------------------	-------------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發言

元代文學大勢說略

李修生*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100875)

大家好。歡迎朋友們參加此次會議,有機會向大家學習,非常高興。

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1986 年的杭州會議上,提出了古籍所建設的標準。並要求古籍所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學術特色,並且提出了通過搞重點的古籍整理項目來帶動研究工作。我們正是根據這一意見,經過古籍所全體研究人員的商討,決定以元代文史研究為主要研究方向,並且於 1987 年提出了編纂《全元文》的計劃。1991 年 12 月正式立項。《全元文》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全國高校古委會與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共同享有《全元文》的版權。

《全元文》的編纂從 1983 年進入了校點階段,從 1988 年開始進行普查工作。目前全書共出版 60 冊,收入作者 3200 餘人,其中有文集作者 190 餘人,共收文 34000 餘篇,2800 餘萬字。全部工作,當時基本是手工操作,傳統的剪刀漿糊。參與工作的人員非常辛苦。在某些學術氛圍下,工作條件是非常困難,在此,我對各位參加工作的同仁同事再一次表示感謝,也感謝各位編委、各位顧問,感謝鳳凰出版社的朋友們。

該書出版之後,得到了學界朋友們的關愛、鼓勵,並具體地提出了意見,甚至將讀書筆記交給我們。我向這些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

我們所現在由韓格平教授領導,經所內研究討論決定,我們今後仍然以元代文化與文獻研究為主要任務,希望在元代文史資料的搜集與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成為元代文史研究的基地之一。全國高校古委會已經將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交流列為重要工作,我們希望,今後能加強與各國學者特別是與日韓的學者的交流,因為日韓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著堅實基礎。加強與各省包括港澳臺學者共同學習,推動研究。

元代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對明清乃至於近現代乃至今日世界,有著重要影響。但目前的研究工作與其他領域相比較,似嫌薄弱。希望來日與海內外的同道一起,整理研究,促進研究工作的開展、希望我們保持更加緊密的聯繫。謝謝朋友們。

* 李修生(1933—),男,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教授。

元代文學(1206—1368)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是一個有豐碩文學成果的時期。但現在研究界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仍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較薄弱的環節。元代文學文獻的整理已有了初步的進展,今後元代文學研究有可能出現一個新局面。關於元代文學的認識,我近年來曾經有過一些思考,先後寫過《元代文學研究芻議》、《元代文學再認識》、《20世紀元代文學宏觀研究鳥瞰》、《十三世紀文學》、《十四世紀文學》等小文。近日,我把有關問題又進行了一次歸納,談出來向大家請教。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漢語文化圈的擴大,以及地域文化與文學發展等問題。

啟功先生1983年6月4日在新疆烏魯木齊演講時講到各民族對創造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時說:元代蒙古這個民族的兼收並蓄氣魄最大了。是在唐以後各民族的一次大聚會(參看《啟功講學錄》)。元代統一全國,中外文化交流更為活躍,國內各民族文化得到很大程度的交流,多種語言文化、地域文化並存,各民族文學繼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繼續發展。漢語文化仍是中華多元文化的主導力量。漢語文化圈更加擴大。儒學在全國範圍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的黑城出土文書顯示,當地啟蒙教育的基礎課程為《千字文》、《朱文公小學》、《孝經》、《論語》、《孟子》、《大學》等;公文也為漢文,或與漢文同卷另行畏兀兒蒙古文等。漢語文化圈擴大,蒙、藏等民族文化也有發展。但是,由於各地區經濟與文化水準不一,各地區地域文化差異是十分明顯的。不僅北方、西北、西南等邊域地區與中東部地區有很大不同,就是中東部地區,也有很多地域差別。江浙行省東南沿海地區,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而且,從這時開始,曆元明至清中葉,江浙東南沿海一直是中國文化、文學的中心。

元代文學成果十分豐碩,用漢文寫作的著名作家有:楊奐(1186—1255)、耶律楚材(1190—1244)、元好問(1190—1257)、杜仁傑(1198?—1277)、王沂孫(1222?—1291?)、郝經(1223—1275)、關漢卿、白仁甫(1226—?)、王惲(1227—1307)、方回(1227—1307)、劉辰翁(1232—1297)、姚燧(1238—1320)、辛文房、胡長蘊(1240—1314)、劉壘(1240—1321)盧摯(1242?—1314?)、戴表元(1244—1311)、蔣捷(1245?—1310)、汪元量(1245?—1323?)、仇遠(1247—1326)、張炎(1248—1322?)、劉因(1249—1293)、程文海(1249—1318)、吳澄(1249—1333)、胡炳文(1250—1333)、馬致遠、王實甫、趙孟頫(1254—1322)、馮子振(1257—1314)、蒲道源(1260—1336)、宋無(1260—1340)、龔璘(1266—1331)、袁桷(1266—1327)、張養浩(1269—1329)、鄭光祖、柳貫(1270—1342)、楊載(1271—1323)、虞集(1272—1348)、范梈(1272—1330)、歐陽玄(1273—1358)、揭傒斯(1274—1344)、張可久(1274?—1348?)、張雨(1277?—1348?)、

黃潛(1277—1357)、馬祖常(1279—1338)、喬吉(1280?—1345)、薩都刺(1282?—1348?)、吳師道(1283—1314)、李孝光(1285—1350)、貫雲石(1286—1323,)、楊朝英、王冕(1300?—1359)、張翥(1287—1368)、許有壬(1287—1364)、黃鎮成(1287—1362)、張昱(1289—1321)、蘇天爵(1294—1352)、楊維禎(1296—1370)、吳萊(1297—1340)、倪瓚(1301—1374)、迺賢(1309—1368)、泰不華(1304—1352)、高明(1305?—1359?)、顧瑛(1310—1369)、劉基(1311—1375)、陳基(1314—1370)、陶宗儀(1314?—1403?)、羅貫中、戴良(1317—1383)、楊基(1326—?)、丁鶴年(1335—1424)、高啟(1336—1374)。

誠如啟功先生所說,漢文寫的不一定是漢族人寫的。這份名單就包含了多民族的作家。

我們還應指出:蒙古族史傳文學《蒙古秘史》標誌著作家文學的成績,英雄史詩《江格兒》和藏族《格薩爾王傳》是享譽國際的作品。

從列舉的這份名單中,可以看到元代文學的繁盛。考查這些作家的行跡,也自然看到各民族、各地域文學的面貌和文化與文學中心南移的趨勢。

第二,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漢文學創作作家的大量出現。元代是中華各民族的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不應該只談民族矛盾,還應該注意民族融和。談到民族問題,關於岳廟題詠詩,值得說說。元至正二年(1342),杭州修岳忠武王廟,名為褒忠演福禪寺,至正九年完工。寺僧可觀輯《岳忠武王廟名賢詩》一卷,附至元五年成書的《宋史》之《岳飛傳》一卷(傳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記為元刊宋史岳飛傳一卷,名賢詩為附錄),收錄作品者近八十人。其中我們較熟悉的漢族作家和其他民族作家有:趙孟頫、柯敬仲、達兼善(即西域人泰不華)、李五峰(即李孝光)、古汴班彥功、永嘉高則誠、會稽楊廉夫、貫酸齋(即貫雲石)、西夏楊九思、高昌鐵穆爾。我們知道還有不少作家的讚頌岳飛的詩沒有收入這部詩集,但是,僅從這一事例,我們可以知道,過去我們僅從一個作家的岳飛詩,就認為這位作家具有反元的趨向,是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的。岳飛在當時,至少在一定範圍內,他是各民族共同歌頌的英雄。又如貫雲石,本名貫小雲石海涯,畏兀人,晚年選擇在錢塘定居。他是著名的詩人、散曲家,他的散曲、詩詞,我們且不說,他在書畫鑒賞活動過程中與著名詞作家、書畫鑒賞家仇遠(仁近)等的交往值得關注(參看楊鐮《貫雲石評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元延祐元年(1314)貫雲石和趙孟頫、仇遠共同鑒賞北宋畫家李成的《寒鴉圖》,並且題詩一首;延祐三年釋普會邀請仇遠、貫雲石、張仲實鑒賞宋趙孟堅的《四香圖》(畫蘭花、杏花、水仙、梅花),貫雲石亦有題詩留存;大德年間西域畫家高克恭為仇遠作《山村圖》,延祐時貫雲石又為此畫題詩四首。這是各民族作家間的友好往來的又一佐證。

多民族漢文學創作作家的大量出現,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陳垣先生 1923 至

1927年發表了《元西域人華化考》其文學篇論及51人，美術篇論及32人。楊鐔《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有作品傳世者百人上下。著名散曲作家貫雲石、馬昂夫（亦名薛昂夫）均為畏兀人。馬昂夫，號九皋，本名薛超吾兒，著名散曲家。他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詠西湖的散曲，而他的詠西湖散曲集有張可久的題曲，有的有張可久的和曲。蒙古族曲、詞、詩作家薩都刺，蒙古族詩人泰不華，都是著名的人物。詩文作家馬祖常，西域雍古部人，後融入回回族。西域回回詩人迺賢，回回詩人丁鶴年等也頗具影響。這些作家都與漢族、其他民族作家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的詩風確實具有新的特點。有影響、有作品傳世的劇作家楊景賢，蒙古族人，所著《西遊記》六本二十四折，是現存較早《西遊記》題材的文學作品，有重要的價值。

第三，元代不僅是俗文學占有盟主的位置，而且是小說、戲劇等文學樣式的嬗變期。

講史話本是如何發展到長篇章回小說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開創了中國小說史的新紀元，這是不能不談到的話題。講史技藝北宋末年已趨成熟，到了元代更有進一步發展。《新編五代史平話》，一般認為是宋人舊編，元人修訂刊印；也有人認為是金末編印。《宣和遺事》，一般認為是宋人舊本，元時又有增益；或是元人編印。《永樂大典》收元代遺留的平話二十六種，惜已不傳。現存《三分事略》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丙午，1294）建安書堂刊本；至治（1321—1323）建安虞氏新刊《三國志平話》的內容文字基本上與《三分事略》相同。《三國志平話》與《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侯集》、《秦並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續集》，被書商建安虞氏合刊在一起，版式一致，可以推定它們都是至治時期的刊本。《永樂大典》輯本《薛仁貴征遼事略》也是元本。約略推算，講史技藝自宋金至元至治時期已盛行了二百餘年，平話文本出現至元末，也有百餘年。《三國演義》的成書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學界一般認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編寫者，並認為羅貫中也是《水滸傳》的編寫者之一。羅貫中全面繼承宋元平話的優良傳統，又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在十四世紀中後期完成這部巨著的創作（認為《三國演義》成書於元後期或明初的有章培恒、袁世碩、劉世德、周兆新、陳鐵民；認為成書於明初的有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袁行需等主編《中國文學史》）^①。《三國演義》先以寫本形式流傳^②，後在原本的基礎上產生不同

^①周兆新《〈三國演義〉對宋元平話的繼承和發展》（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月版）；周兆新《〈三國志演繹〉成書於何時》（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②明庸愚子（蔣大器）弘治甲寅（七年，1494）序：“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

的刊本，主要有嘉靖本和建安本。

關於南戲興起的時間，近年胡忌先生發現一則材料，經洛地先生披露，即劉埀的《詞人吳用章傳》，傳中說：“至咸淳，永嘉戲曲出，潑少年化之。”咸淳為宋度宗年號，為1265年至1274年。由此可以證明，南戲演變成為完整的戲劇形式不會早於錢南揚先生的推測，錢先生認為南戲在南宋初出現，宋光宗朝（1190—1194）演變為完整的戲劇形式，若從南戲的原始狀態計起，至《琵琶記》產生約有一百二十餘年。南戲是在北宋雜劇的基礎上，吸收諸宮調、唱賺，結合地方俗曲歌舞而逐漸形成的戲曲形式。入元後，南戲與雜劇並行，二者相互交流，孕育著中國戲曲的新轉機。元代晚期，南戲出現了新的繁榮局面。高則誠的《琵琶記》和施惠（施惠是吳門醫隱，還是杭州坐賈，或是施耐庵的字，尚存在不同說法）的《拜月亭》是代表作。《琵琶記》也先以寫本形式流傳^①，最早刊本也見於弘治、嘉靖年間。

從講史和戲劇藝術形式的發展轉化來考察，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是一個重要的階段；若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更是引人注目，大作家馬致遠、王實甫、鄭光祖、高則誠、羅貫中掀開了新的篇章。我國小說、戲劇作品有很多是世代累積型作品，但一些優秀作品的出現，仍然是依靠作家的藝術創造。雜劇是由於關漢卿、白仁甫、馬致遠、王實甫、鄭光祖的出現而輝煌，南戲戲文是因高則誠、章回小說是因羅貫中而開創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話本小說遲至明後期的馮夢龍才得以顯世。這些重要作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第四，文學中心南移和東南沿海文學創作的新因素。

元代文學中心繼續南移。在此以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文學南移，第一次是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東晉都建業至南朝，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元統一後，南移的趨向仍在繼續，根據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資料：

宋崇寧元年（1102）宋兩浙路、福建路總戶數為：3,036,800 戶

（據《宋史》卷85—90 地理1—6）

宋嘉定十六年（1223）兩浙路、福建路總戶數為：3,819,535 戶

（據《文獻通考》卷11 戶口）

元代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總戶數為：6,326,423 戶

（據《元史》卷62 地理5）

元代江浙行省的戶數，主要依據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抄籍數。很明顯，人口的增加是和移民相關的。據統計，江浙行省戶數占當時全國總戶數的45.62%，人口為28，

^①明河間長君嘉靖戊午（三十七年，1558）《琵琶記序》：“偶得國初寫本。”

735,947 人,占全國人口數的 48.28%。這個統計數字並不完全準確,但是,仍然可見江浙行省,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在全國的重要位置。由於大量北方居民南遷,而且,不少是巨族士家,當時的江浙是全國文化的匯合地,杭州、南京、揚州等地形成汴洛“宋音”區(參看李葆嘉《中國語言文化史》第五章“中原漢語的推移發展:北雜夷虜 南染吳越”第三節“漢語主導語言的第二次大變遷”,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南北統一,促進了中原傳統文化的新發展。

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在曹魏以前為上古時期;曹魏至南宋光宗即位(亦即金章宗即位,1190 年)以前為中古,其後為近古。當然,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會有多種不同的意見。這是很正常的。這裏不進行討論。但認為這一時期內出現新的文學因素是大家的共識。所謂新因素,有的認為是資本主義萌芽;有的認為中國社會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不一定與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演變問題連接在一起。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曾經引起討論,並編成討論文集。尚鉞在《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中說:“如果這種關係,可以稱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最初有這種關係萌芽的現象,並不晚於西歐。”“這種類似的現象,中國早在南宋末和元初,就已經隱約看到。”^①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並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1973 年 11 月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作題為《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②的講演,說:“中國文化的延續性是很高的。我們可以從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國的土地上,一直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政治傳統。這個傳統在秦以後便表現為一大統的政府。”“沒有資本主義發生。”世界各地學者也在探討中國歷史的特質,也有多種看法。

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發展中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有一些論著論及。1988 年《復旦大學學報》第一期發表陳建華《元末東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徵初探》一文,文章認為元朝滅亡前三、四十年,東南沿海城市文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軀殼中蛻化出來,呈現出新的色彩,與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異軌同步,遙相輝映。作者 1992 年 6 月又出版《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學林出版社出版)又有進一步論述。1994 年 11 月 23 日《中華讀書報》發表金克木先生的《元代的輝煌》一文提出:“元代作為近代文化的開創時代行不行?”此後,又產生一些著作探討這個問題。本文只是將這些問題提出來,不準備進一步討論。但我想羅列一些現象,供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參考。

從戲劇創作來看,確有一些新的動向,王實甫的《西廂記》、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喬

^①尚鉞《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第 2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6 年 4 月版。

^②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第 136—149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 年 8 月版。